



彭卫 著

走进历史的原野 ——史学续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彭卫 著

走进历史的原野

——史学续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历史的原野：史学续论 / 彭卫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7

ISBN 978 - 7 - 5203 - 0652 - 2

I. ①走… II. ①彭… III. ①史学理论—中国—文集 IV. ①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386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天水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学术研究丛书

总 序

史学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最为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从口耳相传的远古传说历史，到今天信息时代的多元书写，历史之于人类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和文化普及，其作用与价值则更为显著。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是史家的追求，也是时代与社会赋予史家的使命。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和优良的修史传统；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又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波澜壮阔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中，历史对于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对于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培育家国情怀，开发民族智慧，塑造国民性格，熔铸民族精神，其所发挥的纽带作用和规范功能无可替代。在当今史学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认识历史、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普及历史，凸显其聚力铸魂的作用，是历史科学和史学工作者共同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启动，为历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机遇。天水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出版专门史学术研究丛书即由此缘起。

学科建设涉及方向凝练、科学研究、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也与每个学科的自身基础和环境氛围密切相关。我校专门史学科从起步到现在，已经有大约 15 年的建设发展。学科名称从最初的陇右文化到现在的专门史，正体现了学科及其团队由草创到规范，由弱小到壮大的发展历程。作为地方院校，立足地域优势开展学术研究，始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追求。十多年来，学科团队在陇右文化体系构建、科学研究、校本

课程开发和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不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得到社会认可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也围绕陇右文化资源申报国家项目和开展科学研究，进一步整合了学科团队，形成相对固定的研究方向，促进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共同提高。在此基础上组建的专门史学科，以生态环境史、区域文化史和开发史为主攻方向，包括中国政治史、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近年来，专门史先后入选甘肃省重点学科和“飞天学者”设岗学科，依托该学科陇右文化研究中心入选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通过省、校两级立项共建和经费资助，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专门史学科进步明显。团队成员立足各自特长，结合学科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和重点突破，学术研究成果陆续产出。为了展示学科建设新成果，发挥科研成果在繁荣学术和服务社会的双重作用，我们决定资助出版“天水师范学院专门史学术研究丛书”。

我们的初步设想和计划是根据专门史学科建设目标，围绕学科方向，结合团队实际，以发挥学科优势，彰显学科特色，深化史学研究为导向，为团队成员高质量完成项目任务和立足特长开展特色化创新研究提供服务。所以，本套丛书将在学科建设期内，依据团队成员各自研究和自由探索进度陆续出版，即完成一部、成熟一部、出版一部，坚持数年，必有收获。期待并预祝这套丛书在促进学科建设和繁荣史学研究上双获成功！

雍际春

2017年6月8日

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历史学（代序言）

历史学是一门处在变化中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普遍接受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见。今天，不仅一些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如对历史资料的大数据处理使得历史研究工作变得和以往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现实向历史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以及历史研究者对现实的感悟使得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与以往有了不同。

然而，历史学还有一些内在的属于这个学科的永久的内容，变动的历史学前行的轨迹是与不变的历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今天”所需要的历史学都来自这两个方面。

不变的历史学告诉我们的是求真的态度。历史学是一门艰苦的工作，需要从点滴的求真开始。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专业领域，都会从专业领域中的具体研究起步，这是历史研究工作所必需的“碎片”。历史研究的每一项有价值的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严谨的基础上。华而不实的“弗劳德病”^①与历史研究的原则格格不入。

不变的历史学告诉我们的是求真的勇气。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代，那些伟大前辈们不仅用笔也用生命捍卫着历史学的尊严。他们将对历史学的尊重和热爱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无论哪个时代，如果历史学能够保持求真的努力，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就是有希望的历史学；相反，如果屈从于各种外部因素的压力，丧失了求真的自觉，这个时代的历史学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不变的历史学还告诉我们的是历史学家学术自律的情怀。一位国外的

^① 弗劳德（J. A. Froude）是19世纪英国史学家，他治学极为粗疏，人们把这种学风称为“弗劳德病”。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历史学者告诫人们：“思想的诚实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甚至比对科学家更为重要，因为和科学家不一样，历史学家并不能使自己的结论受到实验的检验……所以只有良心是他自己的制约者。”^① 学术良知的范围很广，它不仅包括不弄虚作假，也包括宁静致远，让自己的研究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然而，“文章不写一字空”这个对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在今天似乎变得陌生和遥远。有人说，这个责任应当由浮躁的社会风气承担。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历史学者不能隔绝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气，但他却可以用自己的良心减少和拒绝不利于学术事业的风气的影响。只有这样，传之久远的成果才有可能出现。

20 世纪到 21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尤其是在近 40 年前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召唤下，我们的历史研究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当代”的背景为“当代”的历史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土壤，我们需要理解和回应的历史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在历史学自身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方面，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梳理和解释，关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各种思潮的融会，关于评价历史进步标准的重新认识，等等，这些重大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具备更为宽阔的历史眼光和思想视野。历史研究必须起步于碎片，但不能终止于碎片。历史学需要实证的知识 and 技巧，但历史学者不能成为实证的附庸。历史知识可以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历史经验，但历史学的结晶是思想，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在思想的表达中得到呈现。其间，我们需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关怀，自由和独立思考的获得——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及批判的勇气和能力。

历史学不是显学，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保留了人类的记忆，只有当拥有并且能够自觉地保持住历史记忆，人类才能够让知识的延续而让人类的延续成为可能。这就是历史学魅力最为深刻的根源。现实的社会可以因种种原因将历史学边缘化，但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历史学者不会

^① 里涅尔 (G. J. Renier):《历史: 它的目的和方法》, 转引自 [美] 莫里逊 (S. E. Morison)《一个历史学家的信仰》,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何新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264 页。

因此而沮丧,更不会将现实社会对历史学的边缘化变成历史学研究工作的退化。对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变迁的考察,对于人性的探讨,对于如何走向未来的思考,总之,“通古今之变”是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永恒的动力。

因此,笔者所理解的今天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和最高目标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它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是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制度、伦理和技术的控制下形成的,也受到这个时代人们日常观念和生活准则的深刻影响。历史上人们生存状态的“合理性”亦即其必然的表现,提供了我们对历史的最为广阔的认识。

第二,它要显示出历史性的思考。历史的思考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思考的最大不同是它以时间为脉络清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步履,它的立身是在今天,它的目光则贯穿和连接起不可重复的往昔以及无法想象的未来;因而,这种思考具有了其他学科不具备的纵深感。

第三,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它提交了历史智慧。历史智慧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它能通过我们所记忆的汨汨流动的历史河流,其中既有放眼可见的滔滔洪波和涓涓细流,也有涌动在地表下的暗潮,还有我们不断勘探的干涸的故道——启蒙人类的心灵,提高人类的判断力和道德感。这种启蒙力、判断力和道德感是人类能够进步的根基,它的存在,不仅使过去的错误、痛苦和灾难不再重现成为可能,也能够帮助人类在未来任何时刻努力将我们的创造致力于造福于最广大的人群。

目 录

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历史学(代序言)	(1)
关于历史研究主体谬误的初步分析	(1)
史学流派的意义与价值	
——关于史学进步内在动因的一个思考	(23)
试说历史学的实践性	(30)
再论历史学的实践性	(38)
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	(58)
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	
——从史学本质角度的思考	(86)
关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93)
时代体验与历史知识的汇合	(106)
文化史研究应触及民族的精神	(109)
转型与契合	
——解读秦汉风俗	(114)
风俗与风俗史研究	
——以秦汉风俗为主心	(132)
关于秦汉妇女史研究的意见	(145)
中国古代咏史诗歌初论	(152)
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	(167)
从评说游侠看汉代史家的社会公正观	(192)

关于传统史学遗产扬弃的思考	(199)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其史学观念 (1949 年之前)	(207)
论尼采的历史哲学	(222)
让历史学闪烁出更大的智慧光芒	(236)
今天历史学家的肖像	(241)
变革时代历史学家的责任	(244)
向何处寻觅 ——新时期十年我国内地秦汉史研究的若干分析	(246)
走向未来的秦汉史研究	(251)
评《剑桥秦汉史》	(255)
21 世纪初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实践与经验	(267)
后记	(282)

关于历史研究主体谬误的初步分析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曾不无自豪地宣称：历史学家是世界上最少谬误的学者，因而其著述是教导人们得到过去正确知识的“千秋万世的瑰宝”。^① 这种乐观情绪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并在兰克学派的笔下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物极必反，随着旧实证主义历史认识局限的日益显露，历史知识及其科学价值的局限性也渐受注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以往的历史研究充满了谬误，作为研究主体的史学家多半是愚钝拙智者，“历史是人类知识中最危险的产物……尽管它试图裁定世间一切事物，然而它却根本无法正确帮助人们理解任何事物”，故而，“应在此时此刻，抛弃历史之尸”。^② 应当说，这是史学主体对自身能力认识深化的一个标志。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激进片面的态度，潜在蕴含着拒绝对历史研究中谬误现象进行冷静、全面和科学的分析。本文试图从历史认识论的审视角度，^③ 对 20 世纪历史研究主体——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实践中出现的谬误现象进行初步的类型考察。

第一种类型是对历史现象观察与记忆的谬误，是在学术研究中呈现的

① [古希腊] 修昔底德 (Thucydide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4 页。

② [美] 怀特 (H. White):《历史的负担》(The Burden of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1966 年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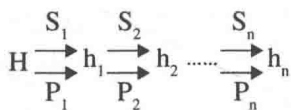
③ 笔者把历史认识论的理论内涵理解为历史研究主体对于历史研究客体的认识方式，以及研究主体对自身认识能力省察的总体把握。

与人的生理、心理活动机制乃至社会实践、价值取向和目标选择直接有关的舛错现象。

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机制异常复杂,视觉余像、知觉广度、触觉差异以及外界的暗示,均可造成感、知觉和情感方面的错误感受,出现诸如视觉错觉、时间错觉、音响方向错觉、触觉错觉混合、移动透视错觉等一系列错觉表象。这种因感、知觉的错觉导致观察过程中产生的谬误现象,在史学家著述中也有所见,如希罗多德因触觉错觉在《历史》一书中对溪水的温度做了非正确判断。如做多学科比较,可以看出感、知觉(视觉、听觉、触觉等)错觉,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至关重要,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历史研究与二者相比有所不同,即感、知觉错觉并不是导致史学研究者观察过程中出现谬误的主要原因,这是由这些学科的不同研究对象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研究特质所决定。同样,因记忆方面的误差造成的谬误,在史学家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和广泛,从而记忆方面的舛误乃是导致史学家观察错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早在古代社会,人们就已经揣测到人的记忆限度以及可能出现的误差。现代实验心理学和生理学对于人的记忆的极限和记忆误差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记忆是对既往材料与经验的保持,这种保持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绝对精确的。由于在人的大脑中,刺激度弱的神经联系很容易被抑制,大量发生过的既往历史事件在人们脑海中会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产生记忆过程中量的差异。为了衔接上零碎的事件,记忆者就会用自己的经验、情感和价值观念进行种种联想,以弥合片段事实之间的裂沟,从而导致记忆过程中质的误差。人类在生理上所具有的这种遗忘本能,正是现存史料无论如何丰富也不可能穷尽历史全过程并蕴含着种种误差的根本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现存的绝大部分史籍都是经过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的辗转流传,由某一位或某些位史学家根据官方档案、传世书文、民间传闻等辑录而成。这是一种原初信息的多次传递过程,从而使史著带上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性色彩(如官方要求、普遍价值观念以及由此影响的个人价值取向等),而不仅仅是个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所受到的局限。如果以 H 表示历史事件的原初状态,以 $S_1 \cdots S_n$ 表示史著在其流传过程中所受到的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以 $P_1 \cdots P_n$ 表示史家个人生理和心理因素(感、

知觉误差及记忆中的舛误) 对于传递史学信息的影响, 以 $h_1 \cdots h_n$ 表示史料的流递过程 (最初传递……最终结果), 则历史事件的原始状态与史料记录的最终结果 (亦即流传至今的各种著述) 之间的传递差异过程图式如下:



没有必要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性。毫无疑问, 在后人感知和认识之前, 历史客体就真实地存在着 (详后)。但是, 遗留至今的各种历史痕迹又不是丝毫不差地、完全“客观”地再现。史料世世相传, 代代相沿, 从而形成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观察必定是一种有目的的, 并由一定的问题以及期望的范围所引导的活动, 无疑渗透着观察者和研究者个人的主体意识以及他所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毋宁说, 历史的记忆乃是对于过去事实的一种重新组合过程, 是人的主体观念对于已消逝的客体的一种连续不断的建构过程。这些客体只是通过观察者、记述者和研究者等一系列的中介作用才被其他人所了解和认知。历史著作作为一种完成了的精神产品, 一旦客观实在地表现出来, 便必然积淀、蕴含和凝聚着不同研究个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生活环境中所形成和表现出的个性、风格、情趣、情感、愿望、理想以及知识、经验与才能等人性方面的各种特征。正因为如此, 任何遗留下来的史料与历史事实原貌均是不可能完全重合的, 任何史料——无论多么丰富——也不能使历史过程全貌尽收后人眼中, 后人所见到的历史记述, 充其量也只及历史实际发生过程的 1% 或 2%。因此, 历史认识客体具有着四重性: 其一, 客体具有客观存在特性, 其存在不以人的感、知觉为转移; 其二, 客体具有对象化存在特性, 其存在具体化为各种人化形态; 其三, 客体具有过程不复的特性, 其存在在总体上是不可重演的; 其四, 客体具有过程残缺的特性, 其存在总是以种种不完整的样式加以表现, 并给主体的判断造成困难。这是历史认识论对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启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高度评价尼采、比尔德、贝克尔等人对历史与历史记述所作的细致区分。尼采首次对历史的“本来”与对历史的描述加以厘定,把历史学分作三类:“纪念碑式的历史”“古代的历史”和“批评的历史”,其中“纪念碑式的历史”集中表现了在史学家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尔德则进一步把历史明确区分为三个层面:“作为事实的历史”“作为记录的历史”和“作为思想的历史”。尼采、比尔德以及历史相对论后继者们的失误,只是在于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历史的非“科学性”和“不可知”倾向。事实上,强调史料与史实之间的距离,并不意味着它匮乏了一个科学、实在的前提,从而只能被卷入艺术世界之中,如怀特在《历史的负担》一文中所描写的那样。这是因为:首先,对客观现象或表现进行“绝对”真实和严格的描述,在任何专门学科中都不存在。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微观客体在经过特定仪器的观测后,其结果依然受到仪器和观测角度的影响,^①这还不包括记述结果的符号在逻辑语义学上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限制。其次,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差异决定了历史知识比自然科学知识包含了更多的相对性因素。历史流向是不可逆复的,但也恰是这一点决定了历史知识之所以成为可能的本质属性:“现在”的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都层次和程度不同地映现了曾经存在的既往,从而使历史知识在活着的“现在”中得到体现。历史研究主体并不是用自己的亲验去看待过去,但也恰是这一点决定了其能够省察过程的深刻性,从而超越亲验层次。再次,在遗留至今的史料中,自然会有无数的人类细微活动,以及某些重大历史活动或其中的细节被漏掉了,但远不完整的记述,却涵盖了重大历史活动的梗概甚至相当具体的内容。在遗留至今的史料中,自然包括了种种谬舛,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却可以通过考证、校订、证伪、辨误等一系列对历史信息的技术整理工作,使后人对历史的了解逐渐逼近历史真实的中轴线。设若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绝对化,则必然导致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彻底否定,从而从一个正确的起点,步至谬误的归宿。这是历史认识论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

① [德] 海森堡 (W. K. Heisenberg):《物理学与哲学》,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4 页。

由此可见,试图“恢复历史全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司马迁的《史记》曾被誉为“文直事核”的“实录”范例,^①但它同样受制于不可避免的观察局限:西汉前期的社会价值观念,史料在传抄过程中形成的种种误差,司马谡和司马迁的个性、情感、生活遭际,以及由“旁搜异闻”和“齐百家杂语”造成的自己对史实的某些误解。所以,在《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某些叙述的确包含着想象、夸张乃至虚构的成分。如《刺客列传·荆轲》写荆轲逼诱樊於期自杀,情节丰富,但当时在场者只有荆轲与樊於期二人,究竟荆轲是否如书中所说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使樊氏心甘情愿自刭,只能是一桩疑案(事实上,在樊氏背秦入燕时就有人建议“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②)。而司马迁却对这一传闻浓墨重彩,强化了荆轲凛然赴死的英雄气概,舍弃了对荆轲形象有损的其他传闻(如时人传燕太子丹“出美人能鼓琴,轲曰:‘好手也’,断以玉盘盛之,轲曰:‘太子遇轲甚厚’”^③)。又如项羽垓下被围,作歌自唱,这或是历史事实,但歌词内容是否就是《项羽本纪》中所云:“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亦很可疑。当时在场者只有项羽、虞姬和若干随从。项羽、虞姬均死,其随从即令不死,也不可能提笔记下或用心默记歌词内容——兵乱心散,势所使然。在这首后人名之为《垓下歌》中,司马迁强调的是项羽“时不利兮”之语,借以和项羽所说的“非战之罪,天亡我也”相映照,并为自己在《项羽本纪》结尾的有关评语提供必要的素材。这说明,在叙写这段历史之前,司马迁的脑海中就已构架出项羽的形象,并据此对有关传闻(包括书文和口碑)加以选择裁定。在西方,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到李维(Livy)、波里比阿(Polybius),到僧正保罗(Paul the Deacon)、亨利(Henry, archdeacon of Hunt-

① 《汉书·司马迁传》班固“赞”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又,《史记》中的部分内容除去后人所补外,也有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文字,如顾颉刚所言:“若楚、汉之际,当为(司马谈)所集材……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见氏著《司马谈作史》,《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2页)本文为叙述上的方便,不做明晰。

② 《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史记》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29页。

③ 《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司马贞《索隐》引《燕丹子》,《史记》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2页。

ingdon), 到吉本 (E. Gibbon)、米涅 (F. A. M. Mignet), 到麦考莱 (T. B. Macaulay)、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等等, 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著作达到功德圆满的完全实录境界, 其中的多数人, 都表现出以自己的主观感受或意愿框裁史料的倾向。这一余波一直流衍至今, 国外有的口碑史学^①家强调, 口碑史学的突出长处在于生动、形象、细腻、传奇性强, 故而避免了文字记述的呆滞。^② 对于历史学的科学性而言, 这个“长处”与其说是优点, 不如说是缺陷。

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 指出“绝对实录”是一种虚谬, 并不表明研究主体因此可以放纵自己的才思, 我们不能从幻想的理想导向对客体实在的虚幻。这一切都是由这个类型的认识特质所确定的。毋庸置疑, 《史记》等著述的优雅文笔和动人情节臻乎上乘, 但是由于在对客体信息选择、整合和构建过程中过分强化了自身的主体意识, 对史料尽可能接近史实的原貌是相当不利的。由此, 我们得到的第三个启示是, 对客体的观察和记述虽也蕴含着反思, 但毕竟是次要得多的方面, 也不是这一认识层次应完成的任务, 故而研究主体应以客体为轴心, 尽量压抑自身的创造性想象、对客体形态的任意选择和情感倾向, 使历史叙述尽可能趋向真实而不是相反。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中, 有四个因素对历史事实的信息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在记述中误差的特点。

第一, 伦理观念。一些心理学家指出: 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 中国人比较重视伦理方面的评价, 其中最重要的维度是“善良诚朴—阴险浮夸”。而且中国人不大善于将人从不同维度上加以感知, 然后整合成总的印象特点。因此, 人们在观察一个人或一件事时, 大都是将其作为一个一致性的对象, 如果当某些信息相互矛盾时, 观察者也会重构材料, 以消除

① 口碑史学 (oral history) 亦译为口述史学。按, 梁启超云: “采访而得其口说, 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第 148 页)。

② [法] 罗贝尔·韦尔尼安: 《写历史的一种新方法》, 晓燕译, 《国外社会科学》1979 年第 1 期。